

doi: 12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6. 029

# 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sup>\*</sup>

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特令人玩味,建安文学是一代乱世下的兴盛;唐代文学是一代治世下的繁荣;明代前期社会状况较好,而文学不兴,后期社会衰败,而文学崛起。现就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作一具体分析,以揭示建安文学一代兴盛的生态原因。

[关键词] 建安文学;唐代文学;时代背景;艺术土壤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9)06-0157-04

## 一、政治上的乱而欲治,从东汉垂死到曹魏新生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政局十分黑暗,帝王贵族奢侈成风,腐败成习,卖官鬻爵,横征暴敛,造成社会的动乱频仍,民生凋弊。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窦宪执掌大权而“威震朝廷”;和帝长成后,与宦官郑众等谋诛窦氏并论功行赏,策勋封侯,从此开始了东汉戚、宦争权,互相倾轧的局面。戚、宦争权最典型的是梁冀与单超,梁冀凭借其妹为顺帝皇后的关系,骄奢横暴,专断朝政二十四年;顺帝死,梁冀立二岁的刘炳为冲帝,不足一年冲帝夭折,梁冀又立八岁的刘缵为质帝,质帝不满梁冀的专横,谓其为“跋扈将军”,梁冀竟“潜行鸩弑”,毒死质帝而改立恒帝,后恒帝暗中联络宦官单超等人,一举翦灭梁冀势力,于是单超等五人封侯,其后“政移五幸,刑淫三狱”,跋扈有加,政局又转为宦官专权(见《后汉书》卷六、卷七)。

戚、宦争权,士人罹祸。士人不满主荒政缪,戚、宦擅权,“羞与为伍”,于是“匹夫抗奋,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大批士人惨遭酷刑杀戮,知识分子由先前的依附朝廷转而游离朝廷或反抗朝廷(见《后汉书》卷九十七)。

朝政腐败又使得卖官鬻爵在东汉末年十分普遍,而其中戚、宦争权,最典型的要数灵帝,公然在

西邸卖官自肥,“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后汉书》卷八),买者一上任,便刻不容缓地搜刮民财,以捞回本钱,增加利钱。如此吏治,哪有百姓的活路?

任何政权,愈是黑暗腐朽,濒临死亡,愈要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愈要残酷剥削压榨,乃至血腥镇压人民,这就愈是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也就愈快地加速它自身的灭亡。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垮台。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必然尖锐化,必然出现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较能清醒地看到东汉政权腐朽灭亡的必然命运,不愿再被绑上战车,作其殉葬品,便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兵刃相见,向其主子反戈一击,要求权利的再分配或再夺权。于是,中原大地,烽烟四起,战祸连年。这是一个大动乱、大分化、大垮台的时期,也是酝酿革命、爆发革命、政权更替的时代。

政治的动乱,把文人学士从庭院、书斋抛向社会、民间,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抛向现实生活的疾风暴雨,甚至血雨腥风。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无法逃避这无情的历史命运,无法逃避这风雨的洗礼和铁血的磨炼。“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

\* [收稿日期] 2009-04-25

[作者简介] 傅正义,男,重庆市人,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相门之子”王粲遭乱流离,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命运自更加无法想像,甚至一代名士蔡邕之女蔡琰被乱兵掳掠,流落匈奴,有诗为证:“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蔡琰《悲愤诗》)。如此乱世,他们便程度不同地目睹身受了战乱的痛苦、流离的悲哀、死亡的威胁,程度不同地与苦难的时代一起沉浮,与社会的脉搏同步跳动,使他们认识到生活并非都是风花雪夜,并非都充满画意诗情,生活常常是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常常充满着污秽和鲜血,充满着乱离和痛苦、倾轧和破坏;使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体会,更直接、更真切、更深刻,更远离书呆子气而更接近生活的真谛。铁幕拉开了,沉渣泛起了,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化、表面化、炽热化,整个社会生活象孔雀开屏一样向作家展示了它的本来面目。如果允许他们写,那么,他们笔下必然内容更充实,感情更真切,更富于生活气息、时代色彩,更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以及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理想和愿望,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深刻的真知灼见,从而与《诗经》以来,特别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一脉承传。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和社会向作家提供了多少“精彩和无奈”,是文学兴盛与否的前决条件。

东汉政权日落西山,气息奄奄,腐朽垂死,但另一方面,它又物极必反,是非反驳,乱而欲治,由垂死而走向新生,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转折的、上升的。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黄巾大起义;它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摧枯拉朽、排污去垢,一扫天下的涤荡,的确是功不可没,使当时污浊的社会政治得到相当程度的净化和康复,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再就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势力之进入政界,犹如一股新鲜血液,为当时垂死的政体注入了生机。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反对分裂,争取统一;开荒屯田,发展生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这种乱而欲治,由汉末的垂死走向曹魏新生的社会政治,使文人学士不致于被动乱所窒息,被苦难所压倒,并且还强烈地激发出中国知识分子拯世济民,兼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重新燃起重整山河,再造乾坤的理想火焰,为他们提供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

功”(曹植《与杨德祖书》)和“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曹植《薤露行》)的机会和平台。时人多谓建安文学为“乱世文学”,的确,没有这个“乱世”,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曹丕的《燕歌行》、《陌上桑》、《上留田行》、王粲的《七哀诗》等大批反映时代乱离、民生疾苦的杰作便无从产生;有人又谓建安为“盛世文学”,为“修齐治平的文学”,曹操的《对酒》、《度关山》、《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虾蟆篇》、曹丕的《秋胡行·尧任舜禹》、《於谯作》、《芙蓉池作》、王粲的《从军诗》等大量高扬政治理想,追求建功立业的诗篇,的确有浓厚的“治平”色彩;然这两种说法皆持之有据,又各执一端,建安文学既不是一代乱世的文学繁盛,也不是一代治世的文学繁盛,而是由乱而治,由垂死而生机焕发,走向新生,这一独特的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代文学繁盛。

## 二、思想上的自由解放,由经学衰微到子学复兴

政治动乱必然引起统治的削弱,统治的削弱,必然引起思想的自由。严酷的现实、苦难的命运,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学”——这个两汉政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并非那么神圣、那么庄严、那么令人顶礼膜拜。它既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包治百病;既不能拔社会于危难,又不能救万民于水火;既非利禄之门,又非善生之道,并非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时经学的独尊地位,出现了动摇,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面临着挑战。各种思想,儒、道、刑名、兵家、纵横家,“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呈现出一种思想自由解放的趋势。东汉恒、灵之世的两次“党锢之祸”,大批名士经师或流徙禁废,或死亡逃匿,血的教训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挣脱经学束缚的群体觉醒;王符《潜夫论》虽“精习经术”,但已“折中孔子”,“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潜夫论》汪序);崔寔《政论》儒法并举,由儒而法,皆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反叛性和异端精神。曹操“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丕“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继承发扬了东汉末年的思想解放思潮,儒法兼取,礼刑并用,从实用理法出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事求是,务本尚用,并且从政治思想层面,结束了东汉后期以来的外戚、宦官专权,结束了两汉经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以士人为主体的政体体制,迎来继春秋战国“诸子互

起,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人的自觉”引起“文的自觉”,思想的自由带来创作的自由。文学需要广阔天地,艺术需要七彩阳光。思想自由,文禁就没有那么严,文网就没有那么密,大批作家才能得以产生、涌现,各种风格流派才能得以形成、发展,文人学士才能敢想敢说,敢歌敢哭,“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敢于冲破禁区,道圣人所未道,言圣人所未言,从而一扫两汉文坛谈经论教、道貌岸然的沉沉死气,诗曰子云、依经立义的腐朽文风,继之以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经济实用、清峻通脱的新一代文风,使文学冲破经学的桎梏,促成文学的觉醒、独立而蔚为大国,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就谓“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sup>[1]</sup>特标经学衰微,子学复兴的思想自由解放,对建安文学繁兴的巨大促进。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一章《建安的文学思想》也指出建安“由经学时代又回到诸子时代”,“思想处于多元化之中,而被经学僵化了的内心世界,到底已经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了。”<sup>[2]</sup>强调思想的多元并存对创作心态的巨大影响。

### 三、用人上的唯才是举,由以经取士到不拘一格

两汉经学,借用儒学的名义,加进阴阳五行、讖纬符命,成为一种荒诞、迷信的神学政治论,成为繁琐迂腐,与世无补,沽名钓誉,换取利禄的一种手段。时谚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学的堕落和信仰的危机。

曹操不用经生腐儒,一反两汉的以经取士而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求贤令》,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又颁布《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再次强调不以德行废人,要以进取取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事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矣。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再次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不以贵贱,不拘品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几道命令,摧毁了两汉以来,以经取士,以门第、德行相招的陋习,杜绝了腐儒经生的利禄之门,确保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然而屈沉下僚,甚至沦落风尘之士,得以鲤鱼跃龙门,跻身历史舞台,傲啸政治风云。曹操登高必赋,雅爱诗章,特别注重启用文学之士,并煞费苦心,一手组建了中国历史第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与杨德祖书》)蔡琰流落匈奴,曹操千方百计,以金璧赎归;陈琳为袁绍移书,痛骂曹操,然曹操不计前嫌,招降陈琳,官拜司空军谋祭酒;汉末乱离,大批学士云集荆州,他们援道入儒,颇有创新精神,对魏晋玄学兴起有直接影响,曹操南征荆州,得其人才以归,后刘备夺回荆州,仅得其土地而守,真是孰得孰失,自有评判。曹操几乎网罗了当时天下的所有文学英才,他们互相唱和,互相切磋,“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促成了建安文学的一代繁兴。

### 四、文学上的“雅爱诗章”,由“内兴文学”到“经国大业”

如果说乱而欲治,由东汉垂死到曹魏新生的特定社会政治状况,为本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思想上的自由解放,由经学衰微到子学复兴,则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创作的通脱与自由,促成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用人上的唯才是举,由以经取士到不拘一格,又提供了作家队伍建设的有利机制和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那么文学上的“雅爱诗章”,从“内兴文学”到“经国大业”则直接提升了文学的地位,促进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登高必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乐府诗的诗人,是第一位大量抒写四言诗、五言诗的诗人,并且“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

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组建者、诗文创作的倡导者、“建安风骨”的开创者;曹操以他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身体力行,为建安文学突破经学束缚而独立、觉醒,进而走向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开创性贡献。曹丕不仅自己“优游典籍之场,体息篇章之囿”(吴质《与魏太子笺》),并作为邺下文人集团创作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完成了汉乐府民歌的文人转化,还应特别褒奖的是他对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文学地位的极大提升。两汉时期,经学独尊,辞赋小道,壮夫不为,文学仅仅作为经学的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曹丕《典论·论文》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升到和“经国大业”同样重要的地位,把文学视为与“立德立功”同样不朽的事业。从此中国文学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曹丕《典论·论文》为标志。随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随着文学地位的空前提升,才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总论》)的作家队伍的空前庞大和文学活动的空前高涨,才有“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对文学本质特征,对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体裁、文学批评的全新认识和探索,从而不仅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开启了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成就了“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个高峯,迎来“为艺术而艺术”(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代的到来。

## 五、文学传统的继往开来

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主。建安诗歌的艺术渊源主要源于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古诗。汉乐府民

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渐趋五言的艺术形式,汉末文人古诗中的述志诗、讽谕诗的“言志”传统,《古诗十九首》的“深哀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的抒情手法,为建安诗歌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借鉴。曹操诗受汉乐府民歌及文人述志、讽谕诗的影响更大,曹丕诗得文人《十九首》及汉乐府民歌的沾溉更甚,曹植则囊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洵为一代宗匠”,“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吴湛《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建安诗歌“彬彬之盛”的过程,实际上是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与文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和述志、讽谕诗的“言志”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将叙事、言志、抒情打成一片,并以抒情为主的新诗体,从而大大增强诗歌的时事性、时代感和情感力量、理性精神,扩大诗歌反映现实的题材领域和表现功能的过程。

建安辞赋的成就也较高,它直接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艺术发展道路,是东汉小赋的进一步抒情化、个人化、骈偶化、诗化的结果,从而抛弃汉赋的“美、刺”宗旨,扭转赋体文学创作方向,“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确立了赋体文学抒情化的方向和华美好看的艺术境界。

### 【参考文献】

- [1]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7.
- [2]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4.
- [3] 傅正义. 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 [4] 傅正义.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 The era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soil of Jianan literature

FU Zheng-y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literature phenomena in several periods are fascinating. Jianan literature was thriving in disordered social times, the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was prosperous in good social order, however, in the early days of Ming Dynasty, the literature was not thriving in the good social order, an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Ming Dynasty, the literature was prosperous in the declined society. The era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soil of Jianan literature are really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cological cause for the thriving of Jianan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Keywords:** Jian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era background; artistic soil